

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及对文化的影响

——基于三个民族村寨的调查

李文勇^{1,2}, 王 苏², 韩 琳²

(1. 复旦大学 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上海 200433; 2. 西南财经大学 工商管理学院, 成都 611130)

摘要: 通过引入索绪尔的时态理论, 探索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从时间维度上分为共时态和历时态, 空间维度上分为强介入和弱介入。调查发现, 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存在三种时空形态, 即共时态弱介入、历时态弱介入, 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强介入, 以及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弱介入。不同时空形态中, 民族村寨在时间和空间维度上介入旅游的程度均有所不同, 对民族村寨文化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也有所差异。

关键词: 民族村寨; 介入旅游; 时空形态; 文化影响

中图分类号: F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5841 (2016) 02-0040-06

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开发及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一直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话题。国内外学者对此进行了广泛的研究。田敏从民族村寨旅游概念、民族村寨旅游对传统文化变迁的影响、民族村寨文化保护途径等方面, 对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相关问题进行了综述^[1]。肖佑兴从旅游者、旅游地社区、旅游业以及全球化与地方互动视角, 总结了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相关研究结论^[2]。研究表明, 民族社区参与旅游的程度与民族文化保护之间存在着密切关系。譬如, 孙九霞提出, 民族社区参与旅游程度与民族文化保护效果具有强参与和强保护、弱参与和弱保护、不参与和无保护、异地参与和异化保护四种发展组合^[3]。民族村寨介入旅游是一个动态的、长期的、系统的时空活动过程, 不仅要空间维度展开分析, 还要结合时间维度进行综合考察。本文以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萝卜寨、甘孜藏族自治州甲居藏寨和甘堡藏寨三个民族村寨为调查对象, 探索分析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及其对民族文化的影响, 以丰富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文化保护的相关研究。

一、时间与空间: 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维度

近年来, 我国中西部地区的众多少数民族村寨, 以其秀美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族文化, 吸引了大量国内外游客观光度假, 民族旅游市场发展迅速。巨大的旅游商机和发展机会, 使民族旅游目的地各利益相关者如政府、企业、社区、居民等主动或被动地介入旅游开发。

民族居民既是少数民族村寨的主体, 又是民族文化的创造者, 在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现有研究多从民族居民的视角出发, 以旅游活动对村寨原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影响程度, 或者以民族居民对旅游提供的生存和生活资源依赖程度作为衡量村寨介入旅游的强弱标准。民族村寨大部分居民在不影响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的前提下, 向游客提供力所能及的简单服务, 或者销售部分家庭农副产品, 赚取少量报酬作为家庭生活补贴, 旅游活动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并行不悖, 这是村寨弱介入的典型表现。旅游活动彻底改变了村寨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大部分居民完全参与旅游经营服务, 成为民族村寨旅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南少数民族传统社区文化环境适应性保护与发展研究”(13CMZ033); 四川省旅游业青年专家资助课题“旅游开发背景下四川少数民族社区文化变迁及保护研究”(SCTYETP2015L16);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旅游创新理论团队”(JBK150507)。

作者简介: 李文勇 (1980-), 男,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民族旅游文化与旅游管理; 王苏 (1980-), 男, 讲师, 研究方向为企业管理; 韩琳 (1984-), 女, 2015 级硕士研究生, 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游产业链上的组成部分, 旅游收益成为家庭收入的重要来源, 旅游活动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趋于同一, 这是民族村寨强介入旅游的主要特征。

旅游活动具有的季节性特征, 在以自然风光见长的少数民族村寨尤为明显, 不少村寨每年5~10月属于旅游接待旺季, 人多时一床难求, 让参与旅游服务的民族居民应接不暇。11月至来年4月为淡季, 人少时门可罗雀, 民族居民又显得无所事事。游客和民族村寨居民都对淡旺季习以为常, 然而看似简单平常的现象背后却蕴含着容易被忽视的丰富内涵。

旅游活动在时间上表现出的淡旺季现象, 将民族村寨原本连续的生活轨迹截然划分为两个不同时段, 从时间维度上引出共时态(synchronic)和历时态(diachronic)命题。共时态和历时态由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提出, 他认为, 有关语言学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 有关演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共时态研究同一个集体意识感觉到的各项同时存在并构成系统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和心理关系, 历时态研究各项不是同一个集体意识所感觉到的相连续要素间的关系, 这些要素一个代替一个, 彼此间不构成系统^[4]。通俗而言, 共时态是研究事物的横向即时剖面, 历时态则是研究事物在一定时期内的纵向演化发展。

引入时态维度后, 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研究呈现出更为广阔的视角。有的少数民族村寨在共时态上属于典型的强介入, 但短短几个月的旺季之后游客日渐稀少, 旅游活动空间消退萎缩, 村寨居民无法继续依赖旅游经营服务维持生产活动, 又部分恢复原有的生产生活方式, 在历时态上表现出弱介入特征, 在此情况下, 绝对判定民族村寨处于强介入或弱介入均与客观事实不完全相符。因此, 只有结合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综合分析, 才能得出尽可能符合客观实际的结论。

二、共时与历时: 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

有限的田野调查发现, 实施旅游开发的少数民族村寨在时空形态上大致分为三种类型, 即共时态弱介入、历时态弱介入, 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强介入, 以及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弱介入。本文以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萝卜寨、甘孜藏族自治州甲居藏寨和甘堡藏寨三个典型民族村寨为例, 分别阐释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三种时

空形态。

1. 共时态弱介入, 历时态弱介入

处于共时态弱介入、历时态弱介入形态的少数民族村寨, 在旅游现象上表现为旺季不旺, 淡季很淡。横向共时态上, 旅游发展一般处于初级阶段, 民族村寨介入旅游接待服务的层次较低, 参与形式单一, 村寨居民从旅游开发中获取的经济及社会增权较小。纵向历时态上, 由于民族村寨地理位置偏僻, 或旅游吸引物市场影响力弱, 村寨全年大部分时间游客稀少, 居民只能少量参与简单的接待服务, 主要仍从事传统生产劳动维持生计。

阿坝州汶川县萝卜寨是我国西部最大最古老的羌寨之一, 至今完整保留着羌族释比文化、羌绣、羌乐等特色民俗。萝卜寨由萝卜寨村、小寨村、索桥村组成。萝卜寨村有214户1071人, 小寨村有64户243人, 索桥村有159户872人, 所有居民均为羌族。其中, 以萝卜寨村最具特色, 是游客参观的主要目的地。这里有200余户黄泥羌房, 户户相连错落有致, 形成壮观的羌族建筑群落。“5·12”汶川大地震中, 萝卜寨的黄泥建筑遭到重大毁损, 后由广东省江门市援建, 在恢复旧貌的同时还极大改善了村寨旅游基础设施。

根据县域经济发展规划, 汶川县旅游局从2003年起就将萝卜寨作为羌族文化旅游的重点民族村寨进行打造, 定位为“云朵上的街市, 古羌王的遗都”。不仅从317国道修筑了5公里专用公路直通萝卜寨, 还从都江堰引进专业旅游投资公司开发村寨。但由于区位、产品等多种条件限制, 旅游市场始终没能打开, 每年只有5~10月有少量游客, 其余时间几乎没有客人。大部分居民以种植樱桃、花椒、核桃、小麦等农产品作为家庭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 与游客没有过多交集。这类从共时态到历时态都处于弱参与状态的民族村寨, 虽然从旅游开发中获得的经济社会收益较小, 但同时, 民族村寨传统受外来文化的冲击也相对较弱。

2. 共时态强介入, 历时态强介入

处于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强介入的少数民族村寨, 旅游产业发展进入成熟阶段。民族村寨完全融入旅游活动, 民族居民原有生产方式因旅游而发生重大改变, 第三产业取代第一产业成为主导, 横向共时态上表现为强介入。由于旅游交

通基础设施良好,具有较强的可进入性,并且旅游活动几乎不受季节性因素影响,市场吸引力强,游客长年不断,民族村寨能够全年不间断从事旅游接待活动,纵向历时态上也表现为强参与。

阿坝州理县甘堡藏寨是这类形态的代表。该寨毗邻国道317线,距成都192公里,距理县8公里,是阿坝州最大最集中的嘉绒藏族部落之一。甘堡意为“山坡上的村落”,全寨现有160户800余人。甘堡藏寨是典型的石筑藏寨,所有建筑都由石头垒成。其中,100年以上的建筑38栋,200年以上的建筑15栋,是一座石头城堡历史博物馆,正好与萝卜寨的黄泥羌寨交相对应。汶川大地震使甘堡藏寨受到较大损失,由湖南省帮助甘堡原址重建,完全恢复地震前的风貌。

目前,甘堡藏寨以“藏家乐”形式提供旅游吃、住、娱等接待服务的家庭有102家,近700间客房,旅游接待已成为村寨居民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距离成都、绵阳、德阳等大中城市较近,车程在3小时左右,路况良好且交通便捷,甘堡已成为都市人群休闲度假的热门目的地,不管是平时还是周末,自驾游客络绎不绝。兴旺的旅游业让村寨居民从年初忙到年尾,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但庞大的游客群体带来持续不断的外来文化刺激,对村寨民族文化产生较大影响。

3. 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弱介入

处于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弱介入的少数民族村寨,在横向共时态上,旅游发展已处于成熟阶段。民族居民积极参与旅游接待,提供住宿、餐饮、民俗体验活动,生产销售农副土特产品,或受雇于旅游企业等,全面介入旅游活动,从中获得经济、社会、心理等多方面增权,属于典型的共时态强介入。但在纵向历时态上,由于地理位置偏僻,或旅游吸引物季节性因素,民族村寨淡季旺季明显。游客主要集中在秋季景色最好的几个月份,一年中至少有6~7个月游客数量很少或几乎没有,旅游活动空间严重萎缩。大部分居民在这期间又恢复原有农业生产活动,民族村寨在历时态上呈现出弱参与特征。

如甘孜州丹巴县甲居藏寨,甲居意为“百户人家”,距四川省省会成都380余公里,地处川西高原横断山脉。甲居藏寨沿卡帕玛群峰顺势向山底河谷延伸,上下落差近千米,红白相间的藏式楼房散布于绿树丛中,景色极为秀美。社区现有3个村民小组,共160余户,700多人。在旅

游带来的现实收益诱导下,大部分居民积极参与旅游接待。

在旅游旺季,村寨几乎所有活动全部围绕游客展开,旅游收入占到多数居民家庭年收入的三分之二以上。当地流传着一句顺口溜:“有房有床,开门前进(谐音钱进)”。意思是说,只要把家里的空房间铺上床,招徕游客入住,很容易就能挣到钱。尝到旅游甜头的民族居民希望一年四季客人不断。可惜由于交通不便,春、冬两季因天气寒冷道路危险,游客极为稀少。没有客人时,居民只得拿起农具下地干活,延续他们熟悉的农耕生活。笔者在田野调查中,亲自用一整天与被访对象共同参与春耕犁地,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类似于甲居这类时空形态的少数民族村寨,从旅游开发中得到的旅游收益不及甘堡,但村寨民族文化受影响程度也异于甘堡。

三、嬗变与发展:时空形态视角下的民族文化生态

宗晓莲指出,文化是发展的、变动的,而非一成不变的。作为文化的外壳、外在表现的各种文化商品(如艺术品、服饰等)可能很容易发生变化,而作为内核的精神层面的变迁更为复杂^[5]。基于时空视角的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形态研究,为深入分析旅游背景下民族文化各层面的发展变迁规律打开新的视野,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不同,民族文化受影响的程度和方式也有所区别。

1. 弱—弱介入对民族文化的离散型影响

共时态和历时态处于弱—弱介入的民族村寨,旅游活动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虽然在特定时空范围内会产生交集,但总体上仍然相互独立。游客与当地居民之间由于行为方式、思维习惯的差异和语言障碍,很少有深入接触,旅游对民族村寨生产生活的改变较弱,民族文化生态系统能够保持相对的延续性,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表现为离散化、碎片化的文化碰撞和文化冲突。

“政府搞旅游把路修好了,我们下雁门(离萝卜寨最近的一个乡镇)方便多了。政府还给村里搞宣传,樱桃比以前好卖多了,游客来了也会买一些带走(访谈LBZ20110402)”。旅游开发使萝卜寨的道路等旅游基础设施得到完善,方便了居民的生产生活,产生一定的社会增权。访谈对象多次提及政府,一方面反映萝卜寨的旅游开发主要由政府推动,另一方面也表明弱介入阶段居

民以旁观者视角看待旅游, 在旅游活动中自我边缘化, 甚至认为游客与自身的关联仅是销售樱桃, “游客来了也会买一些带走”。

羌绣是羌族传统文化的典型代表。“羌绣是我们祖传的手艺, 游客看的时候很感兴趣, 但买的人不多。后来政府请人设计了一些新的图案和样品, 说是城里人会喜欢。有些人照着做了, 但我觉得没有以前的好看, 还是按以前的方式绣, 卖不掉可以留着自家用(访谈 LBZ20110405)”。在传统民族工艺羌绣上, 居民与游客产生了审美观念的碰撞。作为旅游开发主导者的政府认识到羌绣的文化价值与市场价值不对称, 为迎合游客需求, 积极调整设计, 融入现代时尚文化元素。但由于居民对旅游提供的生存和生活资源依赖程度较低, 传统习惯依然发挥着强大的观念和行为的支配力, 即便是最外层的物质层面改变也难以被居民轻易接受。有的居民依然“按以前的方式绣, 卖不掉可以留着自家用”。在弱—弱介入时空形态中, 民族村寨居民的生产生活轨迹与尚处于开发初期的旅游活动轨迹相对独立, 偶有交叉, 旅游活动对村寨文化的影响带有偶发性和离散性, 民族居民也没有形成文化自觉保护意识。

2. 强—强介入对民族文化的聚集型影响

共时态和历时态处于强—强介入的少数民族村寨, 旅游活动空间与居民生活空间几乎完全重叠。旅游业高附加值的产品和服务收益, 使村寨居民放弃传统农耕生产, 在政府、旅游企业引导下全面开展旅游接待。旅游活动对村寨居民生产生活方式产生颠覆性改变, 使其从第一产业的农牧生产者彻底转变为第三产业的服务从业者。民族村寨在历时态上长期处于强介入状态, 旅游活动带来的外来文化影响就像一盏聚光灯, 始终高强度聚焦于民族村寨这个小小的旅游舞台上, 对民族文化各个层次产生持续性、聚集性影响。

“甘堡以前土地少, 人很穷, 现在搞旅游大家都有钱了, 住得好, 穿得好, 吃得好。但好多东西跟以前不一样了, 大家越来越看重钱, 挖空心思挣钱, 有的家为了拉客还相互吵架, 亲戚朋友关系也没有以前那么单纯了, 以前送人情只要50元, 现在至少100~200元, 送少了别人还不高兴。大家都忙着搞旅游挣钱, 换工、跑马会这样的好多习俗现在都没有了(访谈 GB20130302)”。在强—强介入的甘堡藏寨, 旅游给民族居民带来丰厚的经济收益, 极大改善了大家的物质生活水

平, “住得好, 穿得好, 吃得好”, 产生了广泛的经济和社区增权效应。但随之而来的还有市场经济意识, 功利化、物质化等工业社会的现代价值理念对村寨传统文化产生聚集影响, 商业化时代的大众消费特征, 悄悄取代了农耕时代的自然经济特征, 村寨居民“挖空思想挣钱, 有的家为了拉客还相互吵架”。原本由血缘、亲缘和地缘组成的村寨共同体, 受到旅游带来的业缘和事缘新关系的冲击, 在利益驱使下村寨内部熟人社会关系网络被解构, 逐步转向以东道主和游客“主—客”关系为主体的陌生人社会。

一方面, 村寨文化生态系统因外来文化的持续聚集影响而发生变迁, 另一方面, 民族居民却在旅游开发中产生了文化自觉保护意识。“游客要看原汁原味的古老的风俗, 像这些老房子、老家具、老东西, 还有我们穿的藏族衣服, 跳的藏族歌舞, 游客很喜欢, 所以都要保护。如果修成汉人的房子, 来的游客就少了(访谈 GB20130304)”。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中, 民族传统文化是基础和根本, 如果没有民族传统文化, 旅游开发也就成了无本之木、无源之水。同时, 旅游开发的目的是获得经济利益, 这是进行旅游开发的根本所在^[6]。旅游者以自身的消费需求、态度、期望和行为, 向民族村寨居民传递支配旅游消费的文化价值、规则和模式。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以市场为基础进行资源的分配, 市场背后反映的是人们相互的利益关系, 市场交换所涉及的经济利益变化必然会对各种经济主体的行为产生调节作用。通过旅游市场中游客消费行为导向, 民族居民认识到独特的文化既是吸引游客的重要手段, 也可以包装后作为文化商品出售获利, 客观上促使他们产生文化自信和自觉, 认清我群与他群的不同, 强化了地方性认同。

3. 强—弱介入对民族文化的螺旋型影响

共时态和历时态处于强—弱介入的少数民族村寨, 旅游活动空间在特定时间内(旅游旺季)与居民生活空间高度重合, 旅游接待服务是大部分村寨居民的中心工作, 而后随着游客减少, 旅游活动空间也逐渐缩小, 旅游要素暂时消退, 居民生活空间中的传统要素得以部分恢复, 旅游活动对村寨文化生态产生周期性、螺旋式影响。

甲居与甘堡藏寨在共时态上都处于强介入状态, 旅游对民族文化的影响十分显著。“好多来我家住的游客喜欢说话, 不光要问我们这里的情

况,还给我们讲外面的事情,说娃娃要送出去好好读书,有了知识才能了解外面的世界有多大,不走出大山不知道自己的身价,藏族人能歌善舞,如果不出去,永远只能在山里挖泥巴背肥料种地。现在村里好多人都把娃娃送到县城读书,条件好的还送到康定和成都。(访谈JJ20131115)”。民族居民教育理念的改变只是旅游开发产生的诸多变化之一。传统农业社会以体力劳动者为主体,生产技能在实际劳动中以经验形式代代相传,并不需要过多的学校教育,所以大部分中青年甲居村民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老年村民则文盲居多。旅游者将现代工业信息社会对智力劳动者高标准的职业教育要求传递给村民,使其在对现代化的美好憧憬中不自觉地接受并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培养,彻底改变对教育的传统认识。

与甘堡藏寨不同的是,甲居从历时态上呈现出弱介入特征,旅游对传统文化是一种螺旋式冲击,时强时弱具有周期性。“每年七月初十是摩尔多神山的生日,以前大家都要去转山,现在要接待客人,很多人就不去了。但是不忙的时候,他们还是要去转经,不是为现在,是为来世。转经要穿民族服饰,很多年轻人觉得麻烦笨重,不穿了。夏秋季节是我们这里的旺季,客人来得多,国庆过后客人就少了,时间也比较多,现在修房子都尽量选在这些时候,大家又像以前一样去帮工(访谈JJ20131119)”。转经和帮工,是藏族村寨耳熟能详的文化传统。对经济利益的追求,使得民族居民为满足旅游接待服务要求而放弃转经和帮工,但旺季之后会有相当一段时间的旅游空置期,当旅游活动空间消退后,这些传统习俗在甲居又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甘堡由于历时态亦处于强介入,转经和帮工对于已高度依赖现代旅游业的年青一代而言,几乎完全丧失存在的价值,从村寨新的生活环境中永久消失。值得一提的是,作为经济意义上的市场活动出现的旅游开发,在文化意义上扮演了推动文化涵化和文化启蒙的双重动力角色,一方面促成了民族村寨文化与外来文化的交流碰撞,导致民族文化变迁;另一方面,又让民族居民认识到文化的价值,主动参与民族文化保护。

四、结论

大众旅游化时代的到来,让传统意义上的

“贫困者”享有旅游的平等权利,旅游休闲不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全民旅游背景下,充满文化吸引力的西部少数民族地区,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国内外游客。本文调查涉及的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2014年接待游客2876.2万人次,旅游收入242.74亿元,较2013年同期分别增长25%和24%。甘孜藏族自治州接待游客800万人次,旅游收入80亿元,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民族旅游市场的快速发展,使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形态呈现出更加丰富的内容,本文引入索绪尔的时态理论,根据时间和空间双重维度综合审视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及其对文化的影响,研究得出以下结论。

首先,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是一个动态的长期过程,不能仅从横向往时态进行研究,还需结合纵向历时态开展系统研究。从时空视角出发,少数民族村寨介入旅游可分为三种时空形态,包括共时态弱介入、历时态弱介入,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强介入,以及共时态强介入、历时态弱介入。不同时空形态下,旅游开发对民族文化的影响有所不同,共时态和历时态弱—弱介入对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产生离散型影响,强—强介入产生聚集型影响,强—弱介入产生螺旋型影响。影响程度和方式的差异,导致民族村寨文化生态的变迁现象也各不相同。人类学家怀特指出,文化系统像生物体一样,进行自我繁殖和自我扩散。文化是一条交互作用的要素组成的河流,某一特性对其他特性有作用,它们反过来又对这一特性有反作用。某些要素已陈旧过时并被淘汰,新的要素又补充进来。新的排列、组合和综合持续不断得以形成^[7]。民族文化受旅游影响而产生的文化变迁,究其实质,是少数民族村寨原有传统农耕文化与旅游开发带来的商品经济文化,在旅游场域相互碰撞而产生文化冲突、文化涵化、文化适应等一系列复杂的文化现象,也是现代化时代背景下民族文化生态系统产生的文化要素的新陈代谢过程。

其次,少数民族村寨共时态和历时态强—弱介入中出现的民族文化恢复,绝不仅是因为旅游旺季之后游客减少而使居民具有更多的空闲时间所导致。调查发现转经、帮工等民族习俗的部分恢复,其根本原因是由于民族村寨长达半年以上的旅游空置期,使民族居民因无客接待而不得不继续从事熟悉的农业劳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又

恢复了原有生产生活方式。这期间, 民族居民从一个商品经济中的旅游接待者, 又转变为传统的农业劳动者。身份转变的背后, 是生产方式的恢复, 而生产方式恰恰是影响民族文化核心特质的决定性因素。由于少数民族村寨与外部世界的物质文明在客观上存在着巨大差异, 使其在相互的文化碰撞中处于劣势, 产生一些新的文化现象, 但这并非意味着诞生了所谓的文化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 而是民族村寨根据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变化做出的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文化适应性调整。

再次, 民族村寨共时态和历时态弱—弱介入, 虽然没有造成原生态文化系统的较大改变, 但在此时空形态中民族居民亦没有形成自觉的文化保护意识。反之, 强—强介入一方面对村寨文化生态造成了较大影响, 另一方面, 通过旅游市场的引导却让民族居民认识到文化保护的重要性, 产生了民族文化的自信与自觉意识。民族文化传统并非一成不变, 它会根据生产力发展带来的经济、社会变化而赋予新的时代特征, 淘汰与现代文明不相适宜的落后要素, 在既定的场域内通过各种力量的交互作用, 实现文化的“再生产”, 形成更具生命力的传统文化^[8]。在现代化背景下, 民族居民追求现代化生活而导致的文化改变是适应新环境的自然表现, 民族居民在旅游开发中产生的文化觉醒, 促使其理念行为不会背

离传统文化的本质, 从而保持民族村寨社会生活的持续稳定。这也验证了已有的民族社区参与旅游与文化保护关系的研究中, 有学者提出的民族社区强参与强保护, 弱参与弱保护, 无参与无保护。由于受田野调查条件所限, 本文样本具有较大局限性, 今后将努力扩大调查范围, 对更多的少数民族村寨进行调查研究, 使用更为客观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并完善民族村寨介入旅游的时空形态理论。

[参考文献]

- [1] 田敏, 邓小艳. 近十年国内民族村寨旅游开发与民族文化保护和传承研究述评 [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 (6): 36-40.
- [2] 肖佑兴. 国外旅游地社会文化变迁研究述评 [J]. 人文地理, 2011 (6): 19-23.
- [3] 孙九霞. 社区参与旅游与族群文化保护: 类型与逻辑关联 [J]. 思想战线, 2013 (3): 97-100.
- [4] 索绪尔. 普通语言学教程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0: 11.
- [5] 宗晓莲. 旅游人类学与旅游的社会文化变迁研究 [J]. 旅游学刊, 2013, 28 (11).
- [6] 艾菊红. 文化生态旅游的社区参与和传统文化保护与发展——云南三个傣族文化生态旅游村的比较研究 [J]. 民族研究, 2007 (4): 49.
- [7] 怀特. 文化科学 [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8: 84.
- [8] Pierre Bourdieu. Reproduction in education, society and culture [M]. US: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90: 69-70

Time and spatial form of ethnic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and its impact on culture: ——Investigation based on three ethnic communities

LI Wenyong^{1,2}, WANG Su², HAN Lin²

(1. Fudan University, School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Public Policy, Shanghai 200433, China;

2.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School of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Chengdu 611130, China)

Abstract: Ethnic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has been a hot issue of academic concerns. This paper introduces Saussure's tense theory and expands the theory of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ime and space. Based on the research, the time dimension is divided into synchronic and diachronic, and the spatial dimension is divided into strong participation and weak participation. It is found that there exist three categories of time-space form, namely, synchronic weak participation and diachronic weak participation; synchronic strong participation and diachronic strong participation; synchronic strong participation and diachronic weak participation in ethnic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ree ethnic communities'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it verifies the theoretical construction. This study also finds that the degree of participation in tourism varies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tial forms of ethnic communities, which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cultural and ecological system of ethnic communities.

Key words: ethnic minority; tourism participation; time and space form; culture impact

[责任编辑: 徐燕 责任校对: 幸岭]